

云南省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现状探析

李志敏 郭颖梅¹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期下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云南省红河州 2007~2016 年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了居民收入-消费融合状况、经济整体发展融合状况、政府投资融合状况、居民生活融合状况这四大公因子为解释对象,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云南省红河州在这 10 年间,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城乡融合发展状况与国家相关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该地区在集中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对此,该地区政府应该统筹地方财政支出,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总产值;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促进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

【关键词】: 主成分分析 城乡融合 城乡差距 云南红河州

【中图分类号】 F299.2; F320 **【文献标识码】** A

1 研究意义及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以云南省红河州 2007~2016 年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探析云南省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对该地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城乡关系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这几大主题上。近几年开始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这一主题。这也与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性特征相一致。我国学者对我国城乡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为实证研究,且主要关注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杨荣南(1997)是我国最早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学者,他根据量化评价可行性及可理解性,提出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度这五大评价城乡一体化程度指标,并具体到 35 个领域。这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基本奠定了我国评价城乡发展状况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此后的学者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一框架内。李志杰(2009)在杨荣南提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上了“动态发展”这一指标,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分别对我国各地区 1991 年到 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 200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赵明、方辰昊等(2018)认为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括城市经济和城市功能、城乡关系、乡村地域的主体功能这三大领域,并选取了我国若干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曾雯等(2018)则探寻了我国县域尺度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构建,认为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要充分发挥县域作为“城头乡尾”的衔接作用。

从这些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发现,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情况,缺少对某一特定地区的针对性研究。本文则综合运用相关学者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云南省红河州的城乡融合状况进行探究,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作者简介: 李志敏(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郭颖梅(1972-),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课题“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的竞争力评价研究”(NO:JD2016YB09);云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中青年项目“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竞争力研究”(NO. 2015SK01)。

2 实证分析

2.1 指标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和连续性,本文针对可获取的资料,选择了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城乡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比值、城乡常住人口比值、城乡人均社会消费零售额比值、第一产业占总产值比值、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值、城乡人均卫生技术人员比值、农村用电增长率这 8 大指标作为初始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2.2 分析过程

2.2.1 判断分析方法适用性。

本文数据均来自 2008~2017 年《红河州统计年鉴》。下面运用 SPSS23 进行分析。KMO=0.670,大于 0.6,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等于 0.001,远远小于 0.05,说明原始变量适合用因子分析法。

2.2.2 分析过程。

对已统计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公因子。一般情况下,选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但对总方差解释结果分析,第 3、4 个变量对变量的解释均达到 10%以上,且前 4 个因子对总体变量的解释达到 94.47%。结合碎石图,前四个公因子特征值明显大于第 5 个公因子。考虑到对总体变量解释的完整性,所以选取前 4 个因子为公因子。

运用最大方差法对初始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由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得知,第一公因子对 X_1 、 X_2 、 X_3 、 X_8 均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将这些指标定义为“收入-消费”融合因素;第二公因子对 X_4 、 X_6 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将这些指标定义为“政府投资”融合因素;第三公因子对 X_5 这一指标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将这一指标定义为“经济发展”融合因素;第四个公因子对 X_7 这一指标有较强解释能力,将这一指标定义为“发展动态”融合因素。

2.2.3 综合得分。

运用 SPSS23 回归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将各公因子得分标记为 F1、F2、F3、F4,计算后得到各公因子得分,将各公因子得分与其相应的方差贡献率相乘,然后进行求和,得到红河州各年份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评分:

$$F=(39.568*F1+21.547*F2+20.276*F3+13.079*F4)/94.47$$

其中 F 值计算的最终结果为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F 值越高,说明城乡融合发展状况越好。

3 云南省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分析

3.1 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处于不断波动中

2007~2016 年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是基本处于下降的状态,这说明该地区城乡融合状况与之前许多学者的预测不同,城乡差距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综合得分在 2010 年和 2014 年得到小幅上升,之后又处于下降,说明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状况,并未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直处于波动中。

3.2 城乡融合发展状况与国家财政投入密切相关

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在 2010 年增长了 58%,由各因子得分可知,主要是第一、二公因子得分显著提高,尤其是第一公因子得分增长了将近 142%,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贡献显著。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零售品消费支出增加,以及政府加大对农村卫生、交通、住房等固定资产的投入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2014 年综合得分增长了近 52%,主要是第三、四公因子贡献明显,第三、四公因子得分分别比较上一年增长了 340%、113%,这说明 2014 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对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贡献显著。这也有利于缩小该地区城乡差距。

3.3 单纯追求城市经济发展,忽略农村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加大

2007~2012 年期间,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均大于 0,且前期得分都较高,这说明这时期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小,城乡融合情况较好。根据该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应该是这一时期红河州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不佳,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明显,最终城乡融合发展的得分较高。2013 年至今,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一直为负值,且一直在下降。这是由于红河州在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发展。在加大对城镇建设投入的同时,忽视了当地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以及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得分较低。

4 建议

4.1 地方政府统筹财政支出,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

一直以来,我国主要以发展工业为主要任务,导致工农业之间巨大的“剪刀差”,农民承担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量成本。由于政策倾斜导致的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医疗、交通等一系列生活上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短时间的经济自然发展无法改变的,必须同样借助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政策支持才能得以解决。资料显示,2007~2016 年,红河州城乡人均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一直有两倍以上的差距,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最大时有近 35 倍。这说明,红河州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尽管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有限,与对城市投资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此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地方的财政支出,按照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村经济发展给予支持,对于收入水平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予以更多的财政支持。

4.2 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城乡要素流动逐渐从单向转向双向,这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所要求的城乡间要素的双向流动的条件逐渐具备。在红河州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并不要求城乡同步发展,而是要各自发挥自身特色,通过各自优势的互补,实现共同发展。一方面,农村能够提供安全、健康、新鲜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城市为乡村提供了高质量的工业品和服务等。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也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城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人才向农村流动,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需求。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可以使得城乡居民之间有公平的获得资源的机会。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经之路。

4.3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总产值

新型经营主体在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业总产值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鉴于红河州独特的气候环境,反季节水果、蔬菜等产品具有明显优势。如果农村继续采取粗放的散户经营方式,就会出现一系列劣势,如无法形成品牌效应、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缺乏价格谈判优势等。通过引入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使得农业中的“土地、人才、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发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提高农业总产值。最终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4.4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 促进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就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缩小消费差距可以有效促进城乡居民享受质量同值的生活。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一些针对农村的金融信贷不断崛起。但主要是生产性信贷数额不断加大, 即针对化肥、农药、种子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信贷, 相反, 针对消费的信贷增长缓慢。地方金融机构应积极扩大对农村消费信贷的有效供给, 发挥地方金融机构对农村消费的拉动作用, 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缩小城乡居民生活的差距。

参考文献:

- [1] 杨荣南. 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 城市研究, 1997 (02): 20-24.
- [2] 李志杰. 我国城乡一体化评价体系设计及实证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综合考察[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 (12): 95-101.
- [3] 赵民, 方辰昊, 陈晨.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建构——暨若干特大城市实证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 (02): 11-18.
- [4] 曾雯, 张小林, 李智. 乡村振兴视角下县域尺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研究[J]. 池州学院学报, 2018, 32 (03): 1-5.
- [5] 郭俊华, 卫玲. 西部地区城乡生活一体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3, 35 (03): 95-100.
- [6] 陈俭. 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特点及启示[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6, 37 (6): 48-52.
- [7] 葛蕾, 陶小马, 汪宏.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 (09): 93-99.
- [8] 杨志海, 刘雪芬, 王雅鹏. 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 1523 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2 (04): 42-48.
- [9] 谢方, 徐志文. “城乡界面”视角下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机制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8, 39 (03): 94-99.
- [10] 傅蕴英, 卢江, 康继军. 统筹城乡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 (04): 15-25.